



佛像与世相： 南昌市晋墓出土佛教造像金戒指略说

黄丽 (江西南昌市博物馆)

1996年7月,南昌市绳金塔街的晋墓中出土了一枚以佛像为戒面装饰的金戒指。1997年9月,南昌市火车站地下停车场工地的晋墓中又出土了四枚这样的金戒指^①。这几枚金戒指均为实用器,采用锤碟、篆刻工艺制成,是展示当时人们生活和研究佛教传播情况的珍贵实物资料。

这五枚戒指形状大体相似,均为环形,戒面向上伸出,形成“山”形。戒面上有佛像,其身体主要部位系采用锤碟工艺制成,形成凸起的立体感。佛像四周有放射状弦纹,似为“背光”,其下为曲线纹,曲线纹上亦有放射状细小弦纹,似为“莲花座”,戒面两侧的戒指环上亦刻有上下交叉状弦纹。这些纹饰细浅,均采用篆刻工艺制成。一枚出土于南昌市绳金塔街,环径1.5厘米,重2.7克(封二,图四)。余四枚出土于火车站工地,环径依次为:1.9、1.8、1.9、1.5厘米,重量依次为:2.0、2.8、2.2、1.5克(封二,图一、图二、图三、图五),其中,图一、图二、图四造型类似,似为半身佛像,胸部凸起饱满,并篆刻有细小弦纹。图三、图五佛像可见头、身、手臂、腿等,佛像结跏趺坐,两手交叠。其中图二、图三面部清晰篆刻有眼、嘴。造像的美术特征很清晰,符合印度佛教造像的样式。

戒指,亦作“戒止”,别名指环、约指、手记、代指等,是套在手指上的环形装饰物,男女均用,既可戴在左手,亦可戴在右手,所戴数量不限。中国古代在原始社会就有戒指,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的墓葬中已有骨戒指出土。阶级社会出现后,曾一度用作宫廷妇女的避忌之物。《太平御览》卷718《服用部指环》引《五经要义》说:“古者后妃群妾礼御于君

所。女史书其月日,授其环以进退之。有娠则以金环退之,当御著以银环进之。”三国诗人繁欣《定情诗》中有:“何以致辞拳拳?约指一双银。”的诗句,其中所提到的约指就是今天所称的戒指,可见在三国时期,戒指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一种饰品。

佛教传入中国,始于西汉末^②。由于当时社会政治上的动荡,民族之间矛盾时起,经济基础不稳定,因而能以澎湃之势漫透到整个社会。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并不依靠它的经典,而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它的艺术、佛像及经变(用以解释佛教教义的图像),因而佛教在我国又被称为像教。但凡提倡信仰佛教的时代都大造神像,而大造神像的结果必然是掀起更大规模的信仰。中国佛像艺术产生于东汉中期,经过三国两晋的发展,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曾两度出现高峰,有力地推动了佛教的深入传播和发展。

从各地考古发掘的资料中,不断发现早期佛教图像,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与神仙道教形象混置在一起,并没有把佛本身当作独立供奉的崇敬对象。1980年江苏连云港孔望山发现了东汉佛教摩崖造像,佛的基本形象杂置于道教形像中^③。四川彭山崖墓出土的陶“摇钱树”座上塑造的佛像,则完全取代了传统神仙的位置^④。山东沂南画像石墓中的立佛像,把东王公、西王母及两个立佛像都放在石柱顶端^⑤。在江南的孙吴至西晋时,有关佛教造像艺术的遗物品种与数量也不少,主要是贴塑有小佛像的青瓷器或陶器,以及饰有佛教艺术图纹的青铜镜^⑥。东晋墓葬中以佛像作为装饰的器物的发现不多,其载体主要还

是用以随葬的谷仓罐。在这些器物上,佛像出现在神仙或神兽等图像之中,还未脱出作为中国本土的神仙思想和早期道教附属状态而出现。自东晋以后,以佛教造像为器物装饰图纹的习俗为之改观,并从此绝迹。

这几枚金戒指上的佛像,虽然仍只是延续了装饰的意味,而并不是作为真正的礼拜像来供奉,但与此前的考古发现相比,佛像在整个器物上的地位更加独立和突出,形象和意义更为明确,已经明显摆脱了神仙思想和早期道教附属的地位。而把佛像装饰在金戒指这样的日常器物上,则体现了这一时期佛教艺术的世俗化。这可以说明当时人们对佛教的认识正在逐渐深化,佛教已深深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关于早期佛教在南昌地区传播情况的文字记载不甚明了,要揭示南昌地区早期佛教的传播情况,有两位僧人不能不提。其一是安世高。安世高,是佛经汉译的创始人,本名清,是安息国(今伊朗)太子,博学多识,信奉佛教。安世高大致在东汉桓帝(147~167年)前后,到了中土洛阳。汉灵帝主政之末(大约在188年前后)安世高在洛阳的译经活动结束后,为了躲避祸乱,离开洛阳,到南方各地游历,经庐山、南昌至广州,死于会稽。他行走的这条路线,大体反映着当时佛教传播的路线^⑦。梁代释慧皎所著《高僧传》有西域沙门安世高入赣弘法,并在豫章(今南昌)城东肇建东寺的记述,这成为迄今佛教在江西最早的出现。东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年),南昌建大安寺,元代僧人念常著《佛祖历代通载》中记述大安寺“由高而名,盖江淮寺塔之始”^⑧。其二是东晋高僧慧远。慧远,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县附近)人,是东晋杰出的佛教学者,也是江西历史上第一位高僧,对南昌地区佛教的传播有很大的影响。佛教自传入中国起,就与中国的文化结合起来,首先与方士道术结合,以达到祠祀祈福的目的,继而与玄学清谈相结合,而慧远使佛教全面地同中国传统文化紧密地融熔在一起,从而开拓了佛教发展的新时代。慧远在庐山创建东林寺,倡导弥陀净土,成立莲社,实践念佛修持,声名远播,使庐山成为当时南方的佛教交流中心。庐山附近是慧远布教的重点,慧远的师弟慧持曾经给豫章太守范宁讲经。《高僧传·慧

持》中记:“豫章太守范宁请讲法华、毗昙,于是四方云集,千里遥集”^⑨。统治阶层的推崇,极大地推动了佛教在南昌地区的传播。慧远还指导过豫章儒学大家雷次宗,雷次宗是南昌人,少入庐山,拜师慧远,立志好学,尤其是精研《三礼》、《毛诗》。“儒者尝为弟子”^⑩,慧远因而更加声名大振。儒教是中国王权政治说和伦理道德的理论基础,也是精神支柱,而佛教与儒教的思想内容原本不能相容,佛教在中国的存在,就是调合的结果,到了慧远,这种调合达到了成熟的地步。“释迦涂化,于斯复兴”^⑪,佛教在这一时期最终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从王室到朝臣,直到没有文化的社会大众,佛教成为当时民众普遍信仰的宗教。

这五枚佛教造像金戒指的发现,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南昌地区佛教传播的情况以及南昌民众对佛教的崇信程度,对研究佛像的发展也是极为重要的新资料。

注释: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馆:《南昌火车站东晋墓群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2期。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年。

吴焯:《孔望山摩崖造像杂考》,《文物》1989年第12期。

俞伟超:《东汉佛教图像考》,《文物》1980年第5期。

杨泓:《跋鄂州孙吴墓出土陶佛像》,《考古》1996年第11期。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元)释念常撰:《佛祖历代通载》卷五,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

⑩ 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出版,1992年。

(北宋)《李觏集》卷二十四《承天院罗汉阁记》,中华书局,1981年。

(责任编辑:刘慧中)